

馬王堆漢墓帛書



釋校行要

魏 启 鹏 撰
巴 蜀 書 社

● 马王堆汉墓帛书 ●

通行校释

魏启鹏 撰



成都 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汝杰

封面设计：李昆甫

马王堆汉墓帛书

《德 行》校 释

魏启鹏 撰

巴蜀书社 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114 千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80 册

ISBN7-80523-300-4/B·31

定 价：4.50 元

内 容 提 要

《德行》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佚书之一，钞写在帛书《老子》甲本之后。该书提供了战国时代中国思想史的新材料，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珍视。由于原钞本出土时脱烂严重，钞写亦有错、讹、倒、衍，加之字多通假，研读不易。作者运用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全书进行校勘、订补、注释，并以现存的儒家经籍与古佚书加以印证，从而揭示了《德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老子》甲本后的另一种古佚书《四行》，与《德行》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尽管文字残损严重。作者亦尽可能进行了校勘和研究。

《德行》是研究孔子死后儒家八派的第一手资料，属于子思学派的作品，而成书年代早于孟轲。该书反映了战国时代儒家思想的基本趋势：逐渐顺应新兴封建制的潮流，不再一味死守礼乐之治，而开始承认刑政之治；打破先师留下的沉默，重新研讨天道，探求哲学的本体论，循着“天人合一”的思路进而探求以“心”为核心的人性论问题；这一切，成为子思到孟子的中间环节。其“慎独”说则与成书于战国末期的《中庸》大相逖庭。

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疑团，即子思、孟子的“五行”学说，不是阳阴五行的迷信系统，而是道德的五种行为规范。它借鉴和改造了西周以来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乐教，以“五声相和”象征道德五行的完美，使以前专门显示帝王贵族威仪、风范的外在行为，变成一般君子士人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荀子的批评攻击，不能誉之为“反对迷信”。

与历来的错觉相反，秦始皇曾经利用和消化子思、孟轲学派的道德五行学说。西汉以来，儒道合流，《四行》当为此时的作品。从董仲舒开始，道德五行的内容被加以改造。真正用阴阳五行的迷信系统，把道德五行改造得面目全非的人，是深受汉元帝宠幸、精通邹衍一派方术的儒生翼奉。

Inherent Moralities (An Abstract)

Inherent Moralities is an ancient book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Changsha in 1973 in the tombs of Mawangdui of the Han Dynasty. It has given us some new materials about the theory of Chinese Confucian School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s some pages of the original transcript had fallen off when it was excavated, and the book was too archaic and abstruse,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study now. In order to restore its true features, I collated and annotated the book. *Four Charities*, another ancient book discovered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a lot to do with the first one, has been taken in after being briefly annotated.

This book supplies us the firsthand materi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fter the death of Confucius, and it is one of the works written by scholars headed by Kong Ji (grandson of Confucius) and others.

It shows us that the Confucianists had not always been so conservative; they had gradually adapted them-

selves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rising feudal ist system. They had also broken Confucianists' silence about the ontology, by carrying on a vigorous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hich took "mind" as its centre. This had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ethics.

The theory of Kong Ji and Mencius on the five norms of conduct are definitely different from the superstitious Yin and Yang system. It had used for reference and reformed the dance music rites reflec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the education of music regeneration, with the harmony of the five tones signaling the perfection of the five norms of conduct, and this has further turned what was employed to demonstrate the impressive and dignified manner and style of the Emperor and nobles into an inherent demand for the intellectuals' self-cultivation.

The first emperor Shi Huang of the Qin Dynasty had once made use of the theory of integrity mentioned above. In the Han Dynasty this theory had been remoulded by the scholars headed by Dong Zhongshu. Finally, it was completely brought into the Yin and Yang superstition system by the Confucian scholar Yi Feng who was doted on by the Yuan Emperor of Han and was expert in Zou Yan's astronomy, sorcery, etc.

序 一

龙 晦

《马王堆出土〈老子〉甲本后古佚书四种》释文刊出后引起研究思想史、古代哲学史两界的震动，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典籍传世不免书缺有间，因此《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详细内容，迄不为人们所了解，特别是“儒分为八”。一般治哲学史者，只能对孔孟到董仲舒有概括的线索，“儒分为八”怎样分，又怎样传到董仲舒，则是一笔糊涂账。《〈老子〉甲本后古佚书四种》正好提供了我们研究这段思想史的资料，替我们找到一些线索。

孔子是不谈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论语·阳货》曾记载了他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在川上游玩，也悟出了宇宙运动不息的道理，但他可没有像孟子那样说出一篇大议论，而是非常概括性的两句：“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注1〕这在孔子时代是可以的。但到了战国时代，百家兴起，特别是道家，谈天，谈本体，说宇宙的文章多了，那种简要概括的手法显然应付不了当时争鸣的形势，因而子思在《中庸》里就大谈其本体，大谈其道，甚至涂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

如“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这与“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何等相远，这与宣传请龙、请雨的董仲舒的距离显然就近了。（注2）

《德行》中强调“圣人知天道”，强调“闻而知之，圣也”。而对“闻而知之”的圣，是用《诗经·大雅·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去歌颂的，整个《德行》里没有像《中庸》宣传“至诚如神”的宗教色彩，然而它把圣人推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从儒学史由孔子到董仲舒逐步宗教化的角度来看，显然它还未达到《中庸》的地步，因此我们推断它比《中庸》略早，是可以信的。

尽管《左传·文公六年》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但孔子却不大谈“利”，《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梁惠王》对梁惠王“何以利吾国”，劈头就是一句，“王何必曰利。”但是到了“礼坏乐崩”群雄竞逐的战国时代，不言利是与各家竞争不赢的，也很难得时君之好。《韩非子·诡使》：“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商君·开塞》：“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吕氏春秋·无义》提出，“义者，百事之始，万利之本也”。都这样咄咄逼人地提出了“利”。儒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不得不在“利”这个问题上作出些让步。《郡斋读书志》卷十：“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蒙文通先生对

此认为“儒之兼取法家，莫著于此。”注〈8〉但是佚书四篇虽然强调“仁义之所和”，并没有公开大胆地提出“利”，从这点看，如果不是作者过于保守，便应该是他在子思之先，故尚没有感到“利”的重要。

在“贵贵”与“尊贤”问题上，儒家孔子是著名的“贵贵”派，而具有黄老色彩的太公是著名的“尊贤”派。这是一个老问题，《论语》有一段话历来不为学者所重视，《论语·雍也》：“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句话是孔子对于当时政治的评价，也是他对于齐、鲁之学的评价。这句话不能完全依旧注。〈注4〉要配合周初齐、鲁建国政策的不同解释《韩诗外传》卷十“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见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尚功。”周公曰：“‘居世必有刳杀之君矣。’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观之，圣人能知微矣。”〈注5〉孔子生在鲁国，对于周公之政是极佩服的；对于太公望之以“尊贤尚功”治齐，他心中必然有所轩轻。他认为齐要将“尊贤尚功”一变，才可以至于鲁的“尊尊亲亲”，现在鲁已积弱了，虽然有周公的传统，还得要一变，才会回复到周公的大道。因此，“尊贤尚功”与“尊尊亲亲”两种思潮的消长，也就是齐鲁之学的消长。法家是不主张“尊尊亲亲”的，商君在秦，以限制贵公子的特权为务，“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注6〉儒家要适应那个时代，想再要维持“尊尊亲亲”是很难取得群众的同意的，人民群众绝不会容忍那些“血统贵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们头上长期拉屎拉尿，因此在子思的《中庸》里，已把“尊贤”、“亲

亲”平列为平天下的“九经”，而且把“尊贤”的位置放在“亲亲”之前。《韩非子·难三》：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看来子思是比较倾向于尊贤的。佚书四篇提倡“贵贵而后尊贤”，他比子思还要后缩一步，从这点看，佚书四种似乎也应比子思略早。

还有：“慎独”一项，佚书四种也与《中庸》显著不同，《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种“慎独”是以戒慎恐惧去获得的，既有内心的反省，也有外在的无形监督，于“恐惧其所不闻”下，郑注说：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犹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于“故君子慎其独也”下郑注说：“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佔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郑注前部分是谈内修，即内心的反省；后面的郑注提出“若有佔听之者”则是外在的无形监督。因此子思的“慎独”是比较成熟的，既考虑了主观，又考虑了客观。佚书四种说：“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纯从主观考虑以心为统帅，比较简单，因此从“慎独”这一学说看来，似乎佚书四种比《中庸》早。

如果以上我们所论不误，佚书四种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它正是从孔子到子思之间的桥梁，它正是谨守鲁学的标准，没有受到齐学的影响，通篇没有提到管仲，它通篇歌颂礼乐，然而毕竟时代不同，对于那种“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它不能不提倡“有

大罪而大诛之”，它和《周礼·秋官·小司寇》提出的“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也有显著的不同，它引了《世子》的话。按《汉书·艺文志》儒家有《世子》二十一篇，自注：“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弟子的弟子从师传上说是第三代，与子思是孔子的孙同为第三代相同，中国古代一般以三十年为一世，但弟子与老师作为一代来讲，差不了三十年，一但老祖父要看到自己的孙儿有成就，至少得八、九十岁，一位学者看到自己弟子的弟子有成就五、六十岁就可以了。佚书四种既引《世子》，当然要比世子晚，因此佚书四种晚于世子，略早于子思是可能的。

魏启鹏同志夙喜治思想史，在公布《老子》乙本后古佚书四种，曾撰写过有关《黄帝四经》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颖可喜的见解，在那“海内无人问死生”的年代，对我撰写的《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后古佚书四种探原》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注7）在那举世滔滔四凶横行的岁月里真不啻一种“空谷足音”。因此我们便成了学术上的朋友，时相切磋。风雨之夕，也常作一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快谈，我对他的治学能力与眼光锐敏，是很佩服的，现在他把兴趣由《黄帝四经》移到儒家，整理甲本后佚书四种，我有幸先睹为快，看到了他的新著，化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觉得他不管在从哲学史上，或词句考订上都是化了工夫而且很有见地，如在卷一释“慎独”二字，就能舍弃郑注和传统的理解，把“慎”释为“顺”，把佚书的“慎独”与《中庸》的“慎独”分开，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见解，既科学又合于本书的思想系统，卷二之释“言其柏然后礼也”，把“柏”释为“博”，“柏然后礼”，就是恭而博交，然后有礼，就比帛书

整理小组释为“柏当为白”，引《春秋元命苞》：“伯之言白，明白于德”要妥当得多；卷四释“清浊者德之人”，帛书小组认为“按人即果实之仁，犹今言核心”，魏校“仁”是“居”之坏字，居字之上从“尸”，似“人”，下半部分“古”字坏烂，又据《国语·周语下》“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把它释为音律现象，与下文“圣者，声也”，“其谓之圣者，取诸声也”正相应，就比帛书小组释为“核心”要准确得多；又如同卷“其闭盈谓之德”，帛书小组无释，他据《吕氏春秋·君守》“外欲不入谓之闭”，和卷二之“圣之结于心者也”，把“闭”释为“慎独”，不扰于外物，既合于佚书四种“以夫五为一”的思想体系，又和《老子》的“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拉上点关系，因为紧接本文的上部分正说：“清浊者德之居，德者清浊之渊，身调而神过，谓之玄同。”可见他所释的不是巧合，而是有文献和思想体系作根据的。像这种度越帛书小组和独辟蹊径的注释是比较多的。

至于在思想上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启鹏同志本来以思想犀利见称，他循着蒙文通先生开辟的《儒学五论》及诸子学的大道，把“五行”在先秦及两汉的解释，从孟荀到翼奉说得清清楚楚，把郑玄到范文澜的各家解释分析得清清楚楚，使乌烟一团的五行论，能一下为我们所理解，展示了它在历史各阶段上的真面目，这没有穴穿万卷的功力是综合不出来的；另外，他把子思的哲学特点，以及子思重视管仲，重视利，子思把齐学和鲁学作了最大的融合，使得晚周的学术思想更清楚更准确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这种成绩真是勿让前贤而且可以嘉惠士林的。

启鹏同志十分谦逊，他说：“帛书将吸引着几代学者去反复

琢磨，去推敲，去研究消化，在研讨中重新思考，不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他不自满于他现在的成就，认为还需要几代，我看这种谦虚是应该但不必要的。启鹏同志正在英年，以他现在的成就，加之二、三十年的精力，将会多次发千古之奥秘，进思想之奇花。我想，在未来帛书研究卓著的行列里当然还有其他正在冥思苦索的同志，但是我相信，这个行列里将必有启鹏同志和他的学术业绩，这是可以预卜的。

我和启鹏同志有年龄上的差距，但我们在不相同的时代里，在望江楼度过各自不平凡的时代，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术环境哺育长大的，所以论起学术，我们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感觉。看了他的新著，不免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为他高兴，怂恿他早日问世，因此我就忘记了年龄上的差距，为他做了这样一个短序，既以鼓励启鹏同志，也是为了纪念“一别江楼四十年”的师友们，没有他们在思想上的启迪，我们是不会有哪怕是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成就的。

龙晦序于华西后坝

八八年七月

（注1）见《孟子·离娄》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

（注2）见《春秋繁露·求雨第七十四》及《止雨第七十五》。

（注3）见《古学甄微·儒家法夏法殷义》。

（注4）包咸注云：“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也。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者，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也。”他没有触及齐、鲁为政的不同本质。《皇疏》云：“周公大圣，太公大贤，贤圣既有优劣，虽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异。”皇侃虽然识得

“微异”，但“微异”是什么？却没有说出。

（注5）关于这段文字类似的还有《史记·鲁周公世家》，《吕氏春秋·长利》，其它子书也所见多有，但内容最切本文者为《韩诗外传》，故只引了《韩诗外传》。

（注6）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标点本，2230页。

（注7）见《中国哲学》第四辑，三联版，179页。

序 二

李学勤

近十几年,我国不少地点出土古代的简牍帛书,其内容多为前所未见的佚籍,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普遍注意。这些佚籍大都湮没近两千年,分属晚周到汉初的许多家派,对当时学术史的研究关系重大,所以在每一种整理竣事,公布以后,都有不同学科的学者群起探讨。总的说来,研究者所采取的有两个途径:一种是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佚籍研究考察;另一种是学术史的途径,就佚籍的思想内涵作出分析,辨章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佚籍的重要意义无法显示。当然,这两个途径各需要专门的训练和背景,研究者要兼而有之是很不容易的。

日前,四川大学魏启鹏副教授把他的新著《马王堆汉墓帛书〈德行〉校释》寄我。读后深感作者用功甚勤,兼有上述两种途径之长。特别是作者熟谙古代儒家学说,在考释和研究中能广征博引,左右逢源,有不少创见,确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好书。

魏书所释帛书《德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定名《五行》;

《四行》，整理小组定名《德圣》，系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四篇佚书中的一、四两篇。魏启鹏同志早在一九八〇年便写有《〈黄帝四经〉思想探源》（《中国哲学》第四辑），对帛书《老子》乙本卷前佚书进行研讨，本书可以说是他帛书研究工作的继续。

帛书《五行》，整理小组已指出系思孟一派的作品，而《德圣》与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壹〕）。随后好几位学者对这篇帛书作过讨论，但主要精力是放在思孟“五行”说这一问题上。我自己发表过题为《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的小文（《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内容尤有局限，没能将帛书全体置于思孟一派儒学发展的轨迹上来考察。魏书的优点，正在于能比较全面地把握帛书基本思想，指出其在儒学思想史上所居的位置。这不仅对帛书研究，对整个古代儒学的探索也是一个贡献。

子思、孟子一系，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一个支派。按照宋明学者的看法，孔、曾、思、孟乃是儒学的正宗。近代学者多致疑于此，认为曾子、子思没有作过《大学》、《中庸》，并传授于孟子，甚或主张当时不存在思孟一派。帛书《五行》等篇的发现，为《大学》、《中庸》及其他一些儒学著作提供了可靠连锁，使我们弄清了思孟一派的若干基本观点。不管对思孟的思想应如何评价，这一点都是有重要价值的。

对思孟学说研究，曾在四川大学执教多年的蒙文通先生有独到的贡献。他这方面的著作，集中于所编《儒学五论》一书，可惜由于是在抗战时出版于成都，流传不广。前年，蒙默同志所编《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问世，《五论》的本论部分收录其中，读者才能看到。蒙文通先生所论最精采之处，在